

KEEP TENSIONS
UNDER CONTROL

可控的紧张

中日美之间的认知与误认知

张 云◎著



郑永年隆重作序推荐

尽管谁都不愿意看到对抗，
但三边关系在过去几年里动荡不迭，
相互之间的“误认知”是主要原因。

KEEP TENSIONS
UNDER CONTROL

可控的紧张

中日美之间的认知与误认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可控的紧张：中日美之间的认知与误认知 / 张云
著.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4
ISBN 978-7-213-06932-1

I. ①可… II. ①张… III. ①国际关系—研究—
中国、日本、美国 IV. ①D822.3②D831.32③D871.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42583 号

可控的紧张：中日美之间的认知与误认知

作者：张云 著

出版发行：浙江人民出版社（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市场部电话：(0571) 85061682 85176516

责任编辑：陈庆初 吴玲霞

责任校对：朱妍 张谷年

封面设计：厉琳

电脑制版：杭州大漠照排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本：710mm×1000mm 1/16 印张：18.5

字数：22万 插页：2

版次：2016年4月第1版 印次：2016年4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213-06932-1

定价：39.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

序 言

进入 21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后，亚太地区国际关系展现出一幅混沌的图景。一方面，本地区的经济规模日益增强，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欧盟，地区内贸易依存度超过六成，各国中产阶级的不断增加为本地区未来的经济发展提供着强劲的推力；另一方面，本地区的国际政治则展现出无序和令人担忧的趋势，朝鲜半岛核危机、中日东海争端、南海问题、历史问题周期性的升温在经常提醒人们，经济区域化和全球化并不会自动地带来外交上的红利。地区国家都很清楚，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无疑得益于和平稳定的地区国际政治环境。从这个角度看，可以说没有国家愿意看到军事冲突或者战争的爆发。然而，意愿是一回事，结果很可能是另一回事。本地区在今后几十年会保持和平稳定还是走向冲突乃至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本地区最重要的三个国家——中美日之间的互动。

冷静地看，在亚太地区没有比这三个国家更加重要的国家。俄罗斯尽管仍然是世界上疆域最广阔、军事技术也领先的大国，但在国际经济中，无论是市场规模、经济结构还是规则制定方面的影响都有限，冷战后在东亚政治事务中的参与程度不高。虽然俄罗斯在欧洲面临困境，要走向亚太，但它如何成为一个亚太国

家仍然是一个未知数。韩国虽然已经成为发达经济体，但在国际事务中，在可预见的未来，主要精力将被固定在半岛问题上。东盟在地区一体化进程中发挥着积极的建设性作用，然而主要大国之间如果发生战略竞争甚至对抗，东盟的地区多边机制很容易失灵。中美日三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三个经济体，同时也都属于军事力量最强的国家。日美属于正式的军事同盟关系，美国在日本有大量驻军和军事基地；中美分别作为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存在着天然的高度互疑；中日之间则因为历史、领土问题等，严重缺乏互信。准确和理性地认识中美日关系，不仅具有很强的政策和现实意义，还有助于引导舆论和民众理性认知，为决策营造具有弹性的政策空间。

张云博士在过去几年里围绕着中美日关系这个主题，在《联合早报》的个人专栏《纵横天下》里发表了不少有影响的文章。本书系在这些文章基础上修改而成。作者将国际关系理论和中美日互动的政策实践相联系，通过这种通俗易懂的分析方法，为读者提供了具有很强逻辑分析力和实证说服力的高质量“知识产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张云博士用“认知”和“误认知”的分析框架，对中美日的相互认知及在此基础上的政策实践进行的分析，有助于读者从庞大的信息量和瞬息变幻的具体事件中拨开云雾，把握本质。本书从相互认知、战略思考以及具体问题三个角度，分析了三对双边关系以及三边关系整体，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和启发性。作者在中日关系分析方面引入日美关系和中美关系影响因素，为读者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张云博士是我北大的后辈，交往多年。我认为他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来从事这项极富挑战性的研究题目。张云博士先后获得北大法学博士和早稻田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学位，在日本国立新潟大学任教多年，也曾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和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担任访问学者。在中美日三国同时拥有长期学习和工作的经历是比较难得的，无论是学术传统的融合、分析角度与信息获取的多元化，还是人际网络等方面，都为他从事中美日三边关系的研究提供了很多的优势。多年来，在学术研究之余，他笔耕不辍，在《联合早报》的专栏上发表了不少文章，为我们准确、理性地了解三个国家各自的逻辑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作为为数不多的研究中美日三边关系的专门著作，本书对于读者准确认识和研判中美日三边关系以及观察亚太地区的国际关系将大有益处。我相信，从本书中，读者得到的将不仅仅是作者的独到观察和见解，更多的将是作者对国际局势的理性分析精神。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郑永年

2015年2月2日

目 录

001 序 言

第一部分 中日相互认知与中日关系

- 003 中日关系的再正常化
- 009 中日为什么建立不起来战略关系
- 014 中日关系的未来在于真正和解而非新的法律
- 019 美国对日外交的经验值得中国借鉴
- 024 中日关系中的“内压”大于“外压”
- 029 误认知的困境与中日关系之一——预设中国外交革命性转变的危险性
- 037 误认知的困境与中日关系之二——预设日本已经全面右倾化的危险性
- 042 中日相互定位再平衡的几种可能
- 047 中日关系未来定位：稳定的工作关系
- 052 日本的右倾究竟有多可怕
- 057 中日历史问题的症结
- 063 日本领土问题与中日关系未来
- 068 钓鱼岛危机中日本是如何对中国严重误判的

- 073 为什么经济制裁对日本不一定有效
- 084 中日经济外交竞争不应是“零和游戏”
- 089 亚投行参加问题上的中日关系
- 093 日本需要“向前看”的民族主义
- 098 中日首脑会谈要避免出现误判
- 103 日本若不积极融入东北亚和解进程将为时过晚
- 107 日本安全政策的新关键词：“积极的和平主义”
- 111 超越“国强必稳”的思维

第二部分 中美相互认知与中美关系

- 119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目标
- 124 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与中国的外交平衡
- 129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容正展雏形
- 133 中美新型关系与“新基辛格主义”
- 138 美国知识界对中国崛起认知的变迁和中美关系
- 145 亚太地区安全的“美国威胁论”
- 152 美国新亚太安全战略新在何处
- 159 美国战略重心并未东移亚洲
- 163 中国版“重返亚洲”与中美关系
- 167 全球实力转移并没有实质发生
- 171 朝鲜核问题：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第一块试金石
- 175 拜登东亚三国之行的意义
- 179 中国为何不急于设立南海防空识别区
- 184 网络安全不应重蹈军事安全困境的覆辙

第三部分 日美相互认知与日美关系

- 189 日美同盟“强化”背后的日美博弈
- 193 为什么日本右翼势力的民族主义主要矛头是美国
- 198 美国是否还能“管住”日本
- 203 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实质是日美博弈而非
中日问题
- 208 靖国神社问题不大会对日美同盟构成结构性
影响
- 212 围绕东海防空识别区的美日博弈
- 216 日本为什么要修改集体自卫权的宪法解释
- 221 新《防卫大纲》与日本的安全政策
- 227 正常国家与正常同盟之路——日本解禁集体
自卫权与中美日三边关系

第四部分 中美日三边视角下的国际关系

- 235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背景下的中美日三边关系
- 240 中美对日认知鸿沟与中美日三边关系
- 245 中美日间的游戏：理性的威慑与非理性的后果
- 249 中日关系紧张背后的美国战略计算
- 254 美国与中日历史问题
- 259 日本在中美日三边关系中的定位
- 264 日本新安保法案与中美日三边关系
- 268 中美日的“准冷战”及其影响
- 272 东亚“无极化”的未来会怎样
- 278 中美战略博弈与美国亚太同盟的未来

- 283 结束语



第一部分
中日相互认知与中日关系

中日关系的再正常化

2012 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 40 周年，这本应是一个值得庆贺和展望未来的重要年份，但接连发生的风波却给进入不惑之年的中日关系笼罩上了厚重的阴影。事实上，“政冷经热”的状况在 20 世纪第一个十年一直折磨着中日关系。2011 年，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日本为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据日方统计，2011 年日中贸易额接近 3500 亿美元，占日本贸易额的 20.6%。

然而过去十年中，中国最高领导人正式访问日本仅一次，而正式访问美国就有三次，中日双边关系因为历史问题、领土争端等方面的原因出现周期性的恶化。与此同时，双方社会关系也呈现负面状态，当年日本言论 NPO 公布的调查显示，在日本，83% 的受访者对中国没有好感，而在中国，有 65% 的受访者对日本没有好感。中日关系能不能搞好，是对中国建立“和谐世界”理念的直接考验，也是日本是否能获得更多国际认可（包括“入常”）的风向标。与此同时，中日作为亚洲两个重要大国，也是世界第二大和第三大的经济体，其关系也承载着地区以及全球性的责任和期待。面对当前的困局，我们应当如何来破解呢？笔者认为，中日应当朝着真正实现正常化的方向努力。

1972 年体制：不完全的正常化

读者看到上述题目一定会想，中日关系已经正常化 40 周年了，为什么要“再正常化”？诚然，1972 年 9 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从法律上来说的确结束了两国关系不正常的状态。但是必须指出，中日邦交正常化是不完全和不彻底的。

首先，当时双方出于战略需要迅速进行了邦交正常化谈判，很多遗留问题导致政治关系正常化不完全。1972 年，中国从反苏（联）联美（国）的大战略出发，决定尽快同美国在远东的最大盟友日本恢复邦交。日本同样因为中美苏三边战略格局变化，匆匆改变对华政策态度。由于中国没有参加旧金山和会，很多历史问题的处理，中国没有参与其中。事实上，1972 年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机会，但由于服务大战略需要、中日关系应优先实现正常化的思维而错过了机会。据日本资料显示，田中首相在同周恩来总理会谈中曾经提到钓鱼岛问题的处理（日本提出这个问题本身就意味着它认为存在争议），周恩来当即表示这次不谈这个。如果这个记录属实，至少说明中日领土争端的问题在邦交正常化过程中被战略性地回避了。

第二，1972 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属于政治精英的政治决断，但两国民众之间的情感正常化是不完全的。整个过程在双方有限的政治精英交涉中完成，民众基本上没有参与中日最初和解过程，这一点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德法和解的进程有很大的区别。之后的事实证明，民众参与不足的中日和解导致中日关系的社会基础脆弱。

第三，“1972 年体制”带来的主要成果是中日经济关系的正

常化。在过去 40 年时间里，中日经济相互依存有目共睹，The BBC World Service 在 2011 年 3 月进行的对中国经济实力增加的担忧的调查显示，日本是发达国家中最低的（意大利最高，接近 60%，加拿大为 55%，美国为 53%，法国为 52%，德国为 52%，韩国为 49%，澳大利亚为 47%，墨西哥为 43%，英国为 41%，日本为 30%）。这一方面说明中日经济关系的高度互惠，但也表明了单纯的经济关系加强并不会直接转化为政治关系好转和社会联系紧密，后两者需要双方的特别努力才能够实现。

完全正常化不可能

在我们抱怨中日关系正常化不完全的同时，不能忘记中日关系本身内含的一个悖论，即中日关系完全正常化的不可能性。为什么这样说？无论对中国还是对日本，中日关系都不是普通的双边关系，而是非常特殊的复杂关系，讨论中日关系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都十分敏感。中国历史悠久的文明、曾经在亚洲的无敌地位，加上重新崛起始终让日本感到自卑，而日本侵华历史让中国人总是不能抹去被日本逼到差点亡国灭种边缘的耻辱。中日谁都不愿意甘拜对方的下风，这些又同两国的民族主义相结合，使得双方在审视对方时总难以避免感情色彩和不那么宽容。而在国内谈论对方的时候始终存在着政治风险，对于“聪明人”来说，批评对方在政治上往往意味着安全或者至少不会出错，这种思维客观上也反映出中日关系的不正常。

在中国，对于中日之间“政冷经热”的一般解释就是中国实力的变化让日本起了妒忌之心。一些学者和媒体习惯性地将中日关系恶化等同于日本右翼势力抬头、总体右倾化、保守化等，而没有对中国崛起带来的国际影响进行更深层次的分析。在 21 世

纪初，中国学术界曾出现过一段“对日新思维”的讨论，这事实上是对中国崛起背景下如何处理与亚洲关系的重要知识探索，遗憾的是讨论由于各种原因偃旗息鼓。在这之后，讨论中日关系和日本也变得很敏感，同日本交流成为很多人的禁忌。宁可没有交流也不要有所谓的政治风险、舆论风险，反映出部分人的心理。相反，一些在国际问题上持极端观点的人士则发表一些极端言论，这不仅进一步增加了中日关系的敏感程度，而且造成了一种不健康的舆论氛围，即在对日问题上只要抱着宁可强过头也不能示一点弱的思路就安全。这样很容易失去日本的民众。

在日本，不健康思维倾向同样存在。翻看日本的主要报刊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的特点：倾向于把日本的外交活动全部或至少部分解读为针对中国或者牵制中国。例如，日本—非洲合作论坛被认为是要打破中国在非洲的“外交独霸”，日本与太平洋岛国峰会解被解读为瓦解中国的影响力，日本与湄公河流域国家合作加强被认为是要遏制中国对东南亚的霸权野心，等等。这样的做法不仅不利于双方建立互信，也降低了日本外交的道德高度。如果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总是建立在针对另一个国家考量的基础上，那么必定是不能走远和走好的。日本并不乏有识之士，他们真诚地希望中日改善关系，日本的大多数民众也是希望中日友好的，但在以石原慎太郎为代表的极端“强硬派”的强势下变成了沉默的大多数。可悲的是，石原等少数右翼政客或评论家的声音却被媒体反复报道，刺激着中国国民的感情。

正视中日外交文化差异

中日两国应当在承认彼此关系特殊性和敏感性的同时，认真考虑如何管理控制好分歧。笔者认为，正确认识中日之间的外交

文化差异是管理好中日关系的第一步。

首先，中国是大陆多民族文化，日本是海洋单一民族文化，两国对于国家安全的看法有很大的不同。中国作为多民族的大陆国家，西部边陲的民族问题直接关乎国家安全，这些对于岛国日本来说很难有切身体会。从这个角度来看，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藏独”组织在日本开会，中方的强烈反应在日本人看来有些“过头”。日本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岛国，历史上一直担心外国的海上入侵，以及海上通道被封锁后能源进口通道被掐断。换言之，某种意义上来说日本的国家安全事实上就是海上安全。从这个角度看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日本人对于中国军舰进入太平洋的反应在中国人看来是“过度的反应”。

第二，中国看问题讲究政治定性，而日本看问题重视事务操作，两国外交操作方式不同。中国的政治文化中特别重视政治方向是否正确，一旦被判断政治上需要，具体操作上的困难都认为是可以克服的。但日本人考虑问题的思维往往从操作的难易程度入手，预先设想程序上有什么问题。例如，日美同盟虽然被日本大多数人认同为政治上是正确的，但是围绕普天间基地和“鱼鹰”运输机的问题却都是因为具体操作的环节迟迟没有解决好。

第三，中国外交文化特别重视大氛围、大气氛，日本则相对重视具体问题解决。在外交上，中国强调国家关系的整体氛围好坏是解决具体问题的大框架大前提，如果大气氛不好，宁可暂时搁置冷却。日本同样重视氛围，但认为即使双边关系整体氛围不理想，具体问题仍可以继续谈。

第四，中国重视首脑互访的重要性，日本更看重文化和社会交往的渗透力。毋庸置疑，首脑外交具有带动民间交往的风向标作用，但应看到中日两国领导人在民众中的威望是很不一样的。在中国，国家主席和总理具有很高的政治威望和关注度；在日

本，政治家甚至总理大臣并没有受到同等的重视。在日本，民众对于政治家往往抱有怀疑态度，而那些艺术家、建筑家、医生等却常常能够获得更高的社会尊重。笔者曾在班上作过调查，询问日本学生心目中最有影响力的中国人，结果当代人物竟然是姚明。

第五，中国具有重视“老朋友”和“喝水不忘挖井人”的优良外交传统，但是日本更为现实，认同“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中国领导人访问日本时一项不可或缺的议程是会见曾经为中日友好做出过贡献的日本政治家或者他们的后人。这一传统是中国作为大国的宝贵遗产，但是也要看到一定程度的局限性。例如，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大功臣田中角荣首相，在日本社会则部分被视为“金权政治”的象征。

以上五点只是表明差异，并不是说哪一方正确，而且文化有自己的生命力，改变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了解对方的差异，在相互交往时，心里能够想到对方可能不是这样看问题的，就会减少很多不必要的误解和误判。中日之间的关系再正常化可能正是要从这些文化、思维方式的差异入手，才能真正实现。

2012年9月1日